

中國近代轉型時期 的民主觀念

• 張 灝

在這篇短文裏，我想就轉型時代的民主觀念作一簡要的分析，所謂轉型時代是指1895年至1925年前後大約三十年的時間。這是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思潮承先啟後的關鍵時期。首先，就中西文化接觸而言，在1895年以前雖已有半個世紀以上的歷史，但西方文化的散播只限於沿江沿海的幾個大商埠，對於中國士紳社會及傳統儒家思想的主流並無顯著的影響。西方文化真正有廣泛而深入的滲透與衝擊，造成全國性的影響，是始於轉型時代。同時，由於這影響，轉型時代的思想在好些方面出現一些模式，不但對於當時，就是對於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也很有代表性。就這兩點而言，民主思潮自然也不例外，因此，轉型時代是民主思潮由廣泛傳播而開始定型的時代。讓我從兩篇文章說起。

1897年梁啟超在《知新報》上發表〈說群〉一文，在這篇文章內，他提出「群術」這個觀念，以別於他所謂的「獨術」，後者是只靠一個人單獨的力量來維持群體的生存與處理群體的事物，也就是傳統的專制制度。而群術則是指靠一群人的共同的力量來維持群體的生存與處理群體的事務。這種「群術」顯然是指當時才從西方輸入的民主觀念。1920年，毛澤東以一個五四知識分子在《湘江評論》上發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在這篇文章內，他也以「群」這個觀念來說明民主的涵義。他認為民主就是將組成人民的大小群體層累地集合起來，組織起

* 此文係作者為斯德哥爾摩大學主辦的〈當代中國人心目中的國家、社會、個人〉國際學術研討會(1993.6.11-14)提供的論文，現經會議主辦者同意，先行在本刊發表，謹表謝意。

來。這兩篇文章在轉型時期一前一後地出現，很能大體代表這整個時期對「民主」所形成的觀念：民主是以群體意識為前題的。

中國人如何從群體意識出發去瞭解民主？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對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發展有一基本的瞭解。

一 近代西方民主觀念的兩個基本類型

民主觀念，在西方發源甚早，古希臘即已出現，但它在西方傳統的政治思想發展中，常常是譏多譽少。民主觀念在西方受到一致的肯定是十八世紀中葉以後的事。從那時到一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是民主思想定型時期，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到現在可以說是現代西方民主理論發展的時代，影響中國近現代的民主觀念主要是前者。在這一時期，西方的民主思想，大致而言，出現兩種類型：高調的與低調的。

(1) 高調的民主觀

這種民主觀的前題是：民主是為實現一種道德理想而產生的制度。它在西方近代思潮裏相當普遍，例如在一些重要的流派裏，如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法國大革命前後的激進主義 (Jacobinism)，十九世紀的新黑格爾主義 (Neo-Hegelianism)，以及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都有其顯著的形迹。這一型的民主觀，特別是透過共和主義這一傳承，對於西方民主參與以及立憲政體在思想發展上曾有很重要的貢獻。但同時它也往往帶有集體主義與烏托邦思想的傾向。盧騷與馬克思的思想就是顯例。

盧騷的民主觀念，是基於他對自由的兩種觀念：自然的自由與政治的自由（又稱人的自由），前者是指個人不依靠別人而只求個人的自然衝動與情慾得到滿足，後者則是指只有在人類群體的生活中才能實現的自由。這一自由觀念的前題是，人有超乎自然衝動之上的道德品質，這種品質是人之所以為人之道。這種人道的實現或完成就是盧騷所說的政治自由，也是他所真正重視的自由觀念。他這種自由觀念是針對現代文明有感而發，他認為現代人的生活沉淪而且分裂，沒有一個真正人應有的高貴與完整的道德品格。政治自由就是指從現代生活的沉淪與分裂中解放出來而體現道德的品質。因此，他的政治自由觀念是含有極強烈的道德感，是以他所說的「人的自由」取代「自然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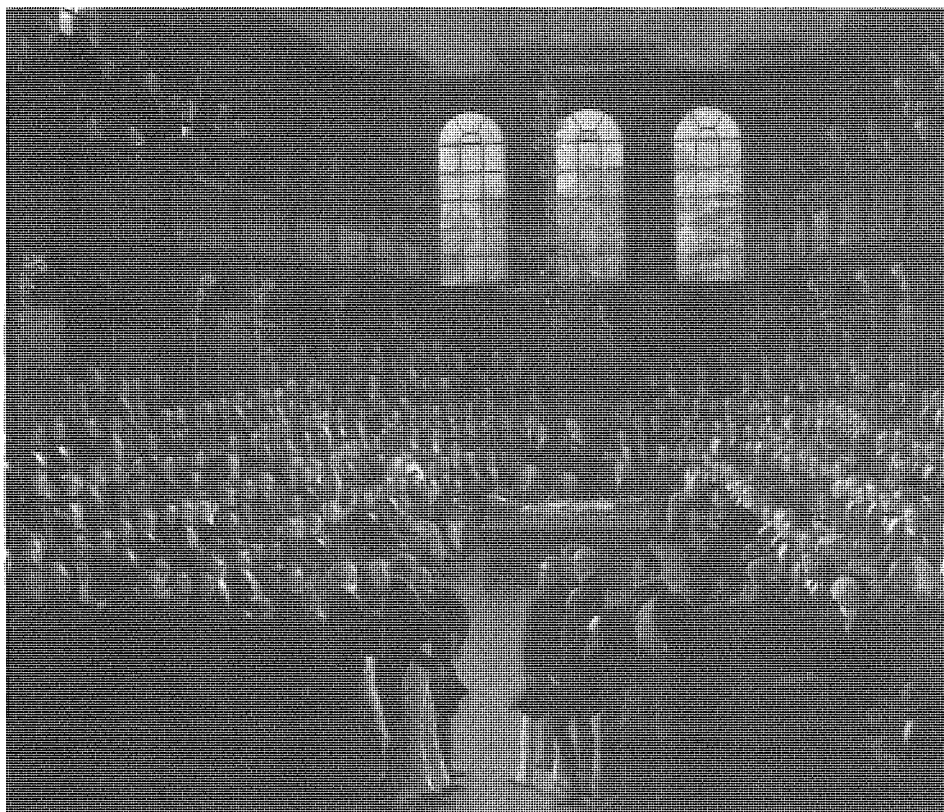
盧騷相信政治自由在古希臘羅馬的城邦政治裏曾經真正實現過。古代城邦政治的最大特色是造成一種環境可以使城邦居民超越自然情慾而認同群體的普遍意志，由此而促使個人道德自我的完成。實現這超乎個人私意、私慾之上的普遍意志就是古代共和政治的最後蘄向。而盧騷的民主觀也就是根據這古典共和主義而構想的。因此它是以集體主義為基調而又非常理想化的：在民主共和政治之下，不但人人自由而且個人自由的歸趨是一個和諧無私的社會。這是一種接近烏托邦的民主觀念。

馬克思與盧騷一樣，認為民主是為實現一個道德理想而設的制度，在這種制度構思裏面是含有強烈的集體主義精神與烏托邦主義色彩。

對於民主的瞭解，馬克思與盧騷頗有類似之處。他對於當時「自由主義式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誠然是抨擊不遺餘力，認為只是資產階級的工具，因此是虛假的、有名無實的制度。但他並不自認是反民主，誠如他在早期作品中所言，他所追求的是一種「真民主」(true democracy)。他這種觀念發之於一種道德理想主義，馬克思早年曾深受德國唯心論的影響，醉心於一個充分體現人道的社會。他強調他所追求的不只是「政治的解放」而是「人的解放」。在他看來資本主義是與他的理想背道而馳的一種制度，因此必須推翻，然後建立他的理想社會。在這理想的社會裏面不僅每個個人有自由，而且全體有自由，個人的意志與盧騷所謂的全體意志達到完全的契合，而「真民主」也就是所謂的「直接民主」，便是到達這個理想社會的必經之路。因此馬克思與盧騷一樣，認為民主是為實現一個道德理想而設的制度，在這種制度構思裏面是含有強烈的集體主義精神與烏托邦主義色彩。

(2) 低調的民主觀

這種民主觀不認為民主是以實現道德理想為目標，而是針對人性的有限而構想的一種制度。西方近代思想中對人性的有限的自覺有兩個源頭，一個是來自猶太教與基督教傳統的人性罪惡觀，一個是來自西方近代自文藝復興以來對人性觀察所積累的現實觀。這二者在思想內容上儘管有很大的不同，但都對人性有一個很低的估價。根據這種觀點，人基本上是一個自私自利，非常有限的東西，你無法對他期之過高。以此為前題，低調民主觀認為民主只是一種制



英美式的民主是低調的民主。

度、一種程序，一則為保護個人的權利不受外來的侵害(不論這侵害是來自其他的個人或政府專制或多數群眾的獨斷)，二則為讓自私自利的庸庸大眾，不論是個人或團體，能夠把他們彼此衝突的權益，以討價還價、你遷我就的方式，互相調節，彼此妥協，和平地共營群體生活。因此，民主沒有甚麼崇高的目標。誠如英國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思想家詹姆士·彌勒(James Mill)所強調，民主不過是為了適應人性的自私自利而發展的一個勉強可行的制度。這種思想在十八世紀末葉的美國制憲論文(Federalist paper)中表現得更為明顯：人的自私自利是本於天性。因此結黨營私，爭權奪利是很自然的事。我們既然無法在本源上根除人的自私自利，只有以制度在效果上去求繩範與疏導，這就是民主政體的功能。這顯然是與高調民主觀很不同的一套民主思想。

二 中國知識分子與高調的民主觀

中國知識分子大規模吸收西方民主思想開始於轉型時期。在吸收過程中，他們對民主的認識大約而言是傾向於高調民主觀，而對於低調的民主觀則甚少措意。前面論及西方的高調民主觀有兩個特徵：一個是烏托邦的傾向；另一個是集體主義的精神。需要強調的是：這兩個特徵也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民主思想中出現。這種高調民主觀的出現是由於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一些特有的思想趨勢。

轉型時代初期，許多人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去肯定民主，強調民主是民族獨立、國家富強所不可少的條件。

(1) 從民族主義的觀點去認識民主

在轉型時期以前就已經有少數的官吏和士大夫認為西方的富強之道在於議會，因為後者可以造成「君民一體，上下一心」(陳熾語)。轉型時代初期，民族主義大量散佈，許多人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去肯定民主。梁啟超和嚴復都曾在他們的言論和著作中，強調民主是民族獨立、國家富強所不可少的條件。辛亥以前的革命派，雖然因種族革命的立場，而對民族主義的內涵與梁、嚴等的改革派持不同的解釋，但是就「民主救國」這一觀念而言，並無異議。鄒容於1903年在「革命軍」中強調西方的民主思想是中國「起死回生之靈藥」。在當時的革命派中，他這種觀念是具有代表性的。

五四時期，在中國知識界裏，民主的涵義擴大，但民族主義對中國人的民主觀念仍有其重要影響。

(2) 從傳統道德的社群取向去認識民主

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是以仁為樞紐的德性倫理，而後者有一個根深柢固的社群取向。在儒家傳統裏，德性倫理是與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緊結在一起的，因此它認為宇宙的真實是超越個別形體的大化之全。而就其價值觀而言，德性倫理的終極標準也是超乎個人的社會全體。因此不論從宇宙論或道德論的觀點，



「全民主義」強調人民大眾才是政治的主體與歷史的動力。從轉型初期開始，一般知識分子都認為全民主義就代表民主思想。

儒家的基本取向是超越個體而肯定那共同的宇宙或社會整體。而「公」這觀念就代表這種整體取向。轉型時期，德性倫理雖然在動搖中，但這社群取向，仍然深植人心，有意無意地決定着中國人對事物的看法。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就常常是以這社群取向為出發點而認識民主的。在他們看來，民主是代表一種大公無私的精神，這種精神可以與民族主義結合，視民主為一種群策群力、團結愛國的思想。它也可以與烏托邦主義結合，因而視民主代表一個民胞物與、痾瘵在抱的大同社會。這種烏托邦式的民主思想雖與以民族主義為目的的民主思想在形式上很有不同，但卻同樣地表現了集體主義的精神，值得注意。

烏托邦式的民主思想在轉型時代初期即曾出現，康有為與譚嗣同的思想裏都有很強烈的這種趨勢。他們分別以儒家「仁」的理想為基礎，來吸收西方的民主思想，因此，他們的民主思想都呈現兩個特徵：一個是世界主義，一個是集體主義。不錯，他們的著作都有要求個人獨立自主的理想，但是這些理想主要是針對傳統的束縛而發。當個人從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以後，必須進一步融化於一個親愛無間、圓融和諧的理想社會。因此，他們的民主思想主題是含有濃厚的烏托邦精神。

這一類型的民主觀念也多少見之於辛亥革命以前的革命思想。鄒容與陳天華對革命的熱情就含有烏托邦式的民主思想，他們認為革命以後，建立民主共和的政體，誠如鄒容所說：中國可以「起死回生，還魂還魄，出十八層地獄，升三十三天堂……」陳天華也預料，「民主革命的結果是宣佈自由，設立共和，其幸福較之未革命前，增進萬倍。」

革命派左翼無政府主義的民主思想中，也有同樣的「高調」傾向。劉師培當

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是以仁為樞紐的德性倫理，而後者有一個根深柢固的社群取向。轉型時期，德性倫理雖然在動搖中，這社群取向，仍然深植人心，有意無意地決定着中國人對事物的看法。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就常常是以這社群取向為出發點而認識民主的。

時的思想演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劉早年深受儒家教育的薰陶，在道德理想主義的影響之下，嚮往一個烏托邦的世界——他所謂的「完全的社會」。1902年盧騷的《民約論》譯成中文，劉讀後深受震撼，寫成《中國民約精義》一書。書中不但反映他對盧騷的民主思想無限嚮往，而且甚至將此種思想與儒家的道德理想如「公」及「大同」相提並論。1906年，他東渡日本，很快變成無政府主義的信徒，在這新的信仰影響之下，他對當時現行的西方代議政體頗為有反感，因而與其他的無政府主義信徒一樣，很少直接肯定民主。但是，因為他努力鼓吹極端的自由平等思想，他不啻在間接提倡一種激進的民主解放思想——一種當時無政府主義者稱之為「平民革命」的思想。

這種「平民主義」誠如劉師培在當時所強調，不是來自以個人主義為前題的無政府主義，而是來自後者與共產主義相結合的集體主義。在克魯泡特金(Kropotkin)、巴枯寧(Bakunin)、普魯東(Proudhon)的思想籠罩之下，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替當時的民主觀念更增強了烏托邦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激進色彩。

這種激進的民主思想，在五四時代曾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五四時代的民主涵義，當然遠較以前擴大。五四初期，英美式的溫和民主思想與以無政府主義為代表的激進民主思想都在時代的空氣裏激盪。但是五四後期，激進民主思想大盛，當時的知識青年如傅斯年、羅家倫、毛澤東等都認為民主主義是當時歷史不可抗拒的潮流，這種民主潮流，誠如李大釗所指出，分成兩方面同時並進：一方面是解放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各種類型的人，如婦女、兒童、工人等分別從傳統的制度與思想枷鎖中解放出來。他說：「現在的時代是解放的時代，現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人民對於國家要求解放，地方對於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對於本國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對於強大民族要求解放，農夫對於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對於資本家要求解放，女子對於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對於親長要求解放。現代政治或社會裏面所起的運動，都是解放的運動！」

因此，民主政治，照李大釗看來，「就是解放的精神。可是這解放的精神，斷斷不是單為求一個分裂就算了事，乃是為完成一切個性脫離舊絆鎖，重新改造一個普遍廣大的新組織，一方面是個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團結。這個解放的運動，同時伴着一個大同團結的運動。」毛澤東在當時也有同樣的嚮往，這「大同團結的運動」，他認為就是民主，就是他所說「民眾的大聯合」，就是人類「群」性的充分體現。很顯然的，這種民主觀是以自由解放的觀念為起足點，而以烏托邦精神與集體意識為歸宿。

三 民主與全民主義

前面提到轉型時代的高調民主觀含有集體主義傾向。必須指出的是，這傾向常常表現為全民主義(Populism)。這個觀念是指一變種的、盧騷式的民主思想。在一個民主社會，人民全體是至高無上的政治主體。此處所謂的人民全體不是指社會中全體人民總數的集合，而是指一個道德的總體，有其獨立的生命與意志。因此人民的總體意志不是全體個人私意的總和，而是指一個存乎其中

中國的無政府主義的「平民主義」，不是來自以個人主義為前題的無政府主義，而是與共產主義相結合的集體主義，替當時的民主觀念更增強了烏托邦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激進色彩。這種激進的民主思想，在五四時代曾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而又駕乎其上的道德意志——公意。民主政治就是求這公意的表現。

這種以全民主義為內涵的民主觀念發源於近代歐洲，而常見於二十世紀的亞洲及拉美地區。中國也不例外。在中國，這全民主義最早出現的時代就是轉型時代。

在轉型時代，這種全民主義是以反抗傳統儒家的精英權威主義的思想面貌出現。它一方面捨棄以往精英主義認為聖賢君子是政治主體的觀念，另一方面它強調有別於少數精英的人民大眾才是政治的主體與歷史的動力。從轉型初期開始，一般知識分子都認為全民主義就代表民主思想。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輸入中國以後，這種全民主義演為一種在政治上認同一般低下層勞苦大眾的意識，對中國近代民主思想與政治文化的影響，至深且鉅。

雖然全民主義，相對於傳統的精英主義，是一種嶄新的思想發展，但二者也有類似之處，不可忽略。首先，從傳統精英主義的觀點出發，個別的人民不是政治主體，因此在政治上無足輕重。而從全民主義的觀點，普通個人也不是政治主體，因此在政治上也無足輕重。全民主義不是以個別的人民而是以群眾的整體代替傳統的精英先進。總之不論就傳統的精英主義或新的全民主義而言，個人在政治上都不是終極價值，都受到忽略。再者，傳統的精英政治的目的是發揮少數精英的精神領導，因此培養精英先進的道德素質是傳統政治的着重點。而現代全民主義的着重點是提高群眾的精神與道德素質以發揮他們的積極性與動力。因此，這兩種政治觀念都是以強調道德與精神的重要性為前題，而有忽略外在制度的趨勢，而這種趨勢多少反映出傳統政治文化與現代中國政治文化都有對人性過度樂觀與信任的傾向，因而忽略人性中的陰暗面在個人與群眾之中同樣有其危險性。

更重要的是，在轉型時代，精英主義並未被全民主義所完全取代，而往往只是暫時被它所掩蓋或吸收。因此，在當時知識分子的民主觀念的表層之下，往往隱藏着精英主義，與全民主義形成一種吊詭的結合。例如梁啟超在轉型時代初期，鼓吹他所謂的「民權」思想，強調國民的總體是政治的主體與歷史的動力，但同時他也寫大量中外英雄豪傑的傳記。他寫這些傳記固然一部分是為了宣傳新的人格理想，灌輸新的道德價值，但多少也反映他認為少數的精英是推動歷史的動力。他在《新英國巨人克林威爾傳》中，就曾極力推許卡乃爾(Carlyle)的英雄崇拜論。他說：「徵諸古今東西之歷史，凡一國家一時代社會之污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與否為斷，惟以其國民之知崇拜英雄與否為斷。」在他當時寫的《自由書》中，同樣的論調也屢見不鮮。例如，他在論「豪傑之公腦」一節下面有這樣的話：「世界者何，豪傑而已矣。舍豪傑則無有世界。一國雖大，其同時並生之豪傑，不過數十人乃至數百人止矣，其餘四萬萬人，皆隨此數十人若數百人之風潮而轉移奔走趨附者也。」

這種精英主義不僅反映傳統的聖賢崇拜，同時也反映一種客觀環境的現實需要。梁啟超與嚴復等人提倡民權鼓吹群眾的言論常常是伴以提高「民智、民德、民力」的呼籲。這顯示當時知識分子的一種困境感。一方面在理論上他們強調群眾是神聖的，人民的「公意」已取傳統的天意而代之。另一方面，就實際情況而言，他們也知道人民大眾的愚昧與落後，需要提高他們的「德、智、體」

不論就傳統的精英主義或新的全民主義而言，個人在政治上都不是終極價值，都受到忽略。這兩種政治觀念都是以強調道德與精神的重要性為前題，而有忽略外在制度的趨勢，而這種趨勢多少反映出傳統政治文化與現代中國政治文化都有對人性過度樂觀與信任的傾向。

各方面的素質：一方面他們在理論上宣揚群眾是歷史的動力，社會的巨輪，另一方面他們也知道一般人民在現實情況下，往往不是處於積極主動的地位，而是處於消極被動的地位。基於這種困境感，他們有以「先知先覺」自居的需要，去從事宣傳教育工作，以提高群眾的素質。從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到五四的《新青年》，轉型時代的知識分子積極從事文字宣傳及言論鼓吹工作，都或多或少地有這種精英先進的自我意識。因此，在群體意識中，全民主義與精英權威主義往往有吊詭的結合。

這種吊詭的結合使轉型時代的民主思想帶有相當的不穩定性與脆弱性。因為精英權威主義的邏輯加上危機時代的種種客觀環境，很容易使人感覺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中心，以應付危機與變局。轉型時期的民主思想已經時而有這種政治權威主義心態出現。在當時的改良主義裏面，梁啟超的思想演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1899年至1903年間大力宣揚民權論旨時，他的思想就含有濃厚的全民主義的傾向。1903年以後，他日感中國人民大眾的文化教育水準落後，不能行使民權，需要精英領導，終而提出「開明專制」的主張。在革命派裏面，前有陳天華，後有孫中山都有類似的思想演變，衍生出政治權威主義的趨勢。五四時代，陳獨秀最後走上馬列的政治權威主義的道路，也多少與他思想中的全民主義與精英主義的吊詭結合有關。他在1920年前後，公開指出中國的人民是「一盤散沙，一堆蠢物」，因而需要「開明專制」與精英領導，而就在那時他捨棄民主立場，接受馬列的「民主集中論」，絕非偶然。

上面，我指出民主觀念在轉型時代所展現的一些思想傾向，諸如群體意識，以及隨之而來的高調民主觀與全民主義。這裏必須強調的是：這些傾向，不只限於轉型時代，在以後中國知識分子的民主觀念裏也常常出現。因此，它是我們認識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民主思想發展的起足點。根據這些民主觀念的傾向，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在轉型時代民主思想大量散播以後接着而來的是一個政治權威主義籠罩的時代。這兩個時代一先一後、相繼而來，表面上看去似乎是一個吊詭，而實際上是有其思想內在的聯繫。就是今天在海峽兩岸的民主思潮裏面，我們也不難發現這些思想傾向依舊隱然在那裏發酵，有其不可忽略的影響。

張 灝 1937年生，安徽滁縣人，畢業於台灣大學、哈佛大學。曾著有《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危機意識》、《批判意識與烈士精神：譚嗣同思想研究》、《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中英文等書。現任教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於1992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轉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群體意識中，全民主義與精英權威主義往往有吊詭的結合。這種吊詭的結合使轉型時代的民主思想帶有相當的不穩定性與脆弱性。因為精英權威主義的邏輯加上危機時代的種種客觀環境，很容易使人感覺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中心，以應付危機與變局。轉型時期的民主思想已經時而有這種政治權威主義心態出現。